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 术 讨 论 会



两次“历史性飞跃”之比较

余 茂 笈

安 徽 农 学 院

1991年7月

论文提要

论文分四个部分：

（一）飞跃的理论内容：第一次飞跃的理论内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它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动力、性质、斗争形式、前途和领导等问题；第二次飞跃的理论内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它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问题。仅仅把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作为第一次飞跃的理论内容是不全面的。

（二）飞跃前的曲折探索过程：两次飞跃实现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主革命相结合以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都有两次成功和两次曲折，由此导致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发展。这说明，能否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是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

（三）飞跃的实现：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和民主革命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转折点，也是两次飞跃的起点。“七大”和“十三大”，是两次飞跃完成或基本完成的标志。这既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关键在于党中央领导集体；又说明，它又是全党的事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的理论基础。这两个理论的形成、丰富和发展，都必须坚持这个方向。

（四）几点启示：为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必须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两次“历史性飞跃”之比较

余茂笈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七十年。

党在七十年的奋斗中，面临着两大崇高而艰巨的任务：一是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民主革命；二是在脱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如何把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资源相对短缺、人口众多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了完成这两大任务，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并自觉地把它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探索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①几年来，理论界对这两次历史性飞跃分别进行研究，有不少好的成果。本文试图对它们的理论内容及其实现的过程作比较研究，以加深理解，并从中引出经验教训，以就教于理论界同志。

一、飞跃的理论内容

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是通过量变和质变表现出来的。飞跃，是事物的质变。这里讲的两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目的与任务，在于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不断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过程。虽然这个结合的过程是曲折的，道路是艰难的，但从总体上看是“日益结合”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就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达到自由王国。这个过程就是“日益结合”的过程。因而，两次飞跃是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使人们在认识上出现的飞跃，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的认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理论；第二次飞跃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理论。

“十三大”报告对第二次飞跃的理论内容作了具体的阐述。报告论列了十二个基本观点，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

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指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②十分清楚，第二次飞跃的理论内容，就是包括这十二个基本观点在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其核心，我体会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问题是第一次飞跃的理论内容是什么。“十三大”报告对此没有具体阐述，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报告中讲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因而第一次飞跃的理论内容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

中国革命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多方面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包括“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③，亦即革命的任务、动力、性质、斗争形式、前途和领导等。只有认识了这诸方面的客观规律，才算认识了整个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对我们来说，才不是必然王国而是自由王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经过反复实践，正确地认识了这些问题，创立了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它包括以下基本观点：关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部分的观点；关于革命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依靠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观点；关于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观点；关于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关于建立人民军队实行人民战争的观点；关于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观点；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互相区别又互相衔接的观点；关于建立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的观点，等等。这一理论的创立，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它不同于17、18世纪西欧各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也不同于20世纪俄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第一次飞跃的理论内容，就是包括上述观点在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其核心，我体会就是“一条总路线、三个主要法宝”。一条总路线，说的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主要法宝，说的是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总之，第一次飞跃形成了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动力、性质、斗争形式、前途和领导等问题；第二次飞跃，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问题。两次飞跃的理论内容虽然不同，但其回答的问题是相对应的。

农村包围城市，的确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新观念，它代替了在此以前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所

实行的一直被认为是普遍适用的以城市为革命中心的旧观念，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应用于中国环境的典范，在武装夺取政权问题上是人们认识的飞跃。然而它毕竟是一个局部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除它以外还有其他许多重要问题。因而，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提出只是对武装夺取政权的认识的飞跃，不是对整个中国民主革命认识的飞跃，是事物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不是总体质变，仅仅把它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的理论内容显然是不全面的。

二、飞跃前的曲折探索过程

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在两次历史性飞跃实现之前，人们对革命和建设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初步结合，正确地认识了一些客观规律，这是认识的总体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但由于种种原因，结合受到干扰，认识出现了曲折。认识的曲折导致革命和建设发展的曲折。

在第一次飞跃实现以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相结合有两次成功和两次曲折，由此导致革命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

一次成功是1922—1926年党对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探索。在列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指引下，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表明它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认识，比“一大”有了显著进步，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始结合的标志。这是党对民主革命规律的认识总体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的开始。“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适应当时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积极探索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鉴于当时的国民革命是由各阶级联合进行的，因而探索的重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阶级构成及其特性，以便正确分析中国各阶级的状况，把握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三大”、“四大”等党的会议的文件，以及党的各方面领导人如高君宇、邓中夏、陈独秀、瞿秋白、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等在这期间发表的文章，都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提出了正确的观点。特别是毛泽东，是集正确观点之大成者。到1926年，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分两个阶段；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不但要参加而且要领导革命；要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国民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初步结果，它表现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实际、探讨中国革命的趋势。在这些正确认识的指导下，出现了党成立后的第一次革命高潮，表现为工农运动的蓬勃高涨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但这时的党是年幼的党，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人，都没有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因而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懂得不多。照搬西欧各国革命经验，忽视中国国情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正是利用了党的这一弱点，于1927年上半年在党中央取得支配地位。它放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放弃无产阶级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并压制党内的正确意见，以致当国民党向革命袭击的时候，共产党人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主革命相结合的第一次曲折。

另一次成功是1927—1930年党对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探索。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使党认识到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号召并派遣共产党员到各地发动武装起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率领起义部队，几经辗转，纷纷走向山区和农村，开展农民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但这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坚持“城市中心论”，主张中国革命效法俄国十月革命，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我们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当时被称之为“本本主义”的错误倾向。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生搬硬套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轻视农民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暴动和集中红军主力进攻大城市，这样，在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上，党内开展了一场争论。毛泽东自觉地把争论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公开反对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本本主义，独树一帜、有胆有识地倡导调查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④。遵循这一思想路线，在总结井冈山和其他根据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在这一正确理论的指引下，在中国大地上，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烈火，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然而这时，党内又出现了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同样忽视中国国情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并于1931—1934年间统治了党。它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低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并强行把这一套“左”的主张付诸实践，以致丧失了许多有利的革命时机，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失败。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主革命相结合的第二次曲折。

在第二次飞跃实现以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也有两次成功和两次曲折。

一次成功是1956—1957年党对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理论探索。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任务。探索之初，由于正确地吸取了前八年照搬苏联的经验，由于对我国的建设实际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因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方面提出了好的思路 and 观点。主要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与此相适应，党的工作中心应转移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把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应当说，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焕发出的思想火花是难能可贵的。正是在这些正确思想指导下，1957年的经济工作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但毕竟由于探索的时间不长，有些正确的思想观点提出来了，但缺乏深入的理论论证，以致在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动乱、国内开展反右派斗争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在1957年以后，党中央、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逆转，急于求成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思想开

始出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轨道。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由此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第一次曲折。

另一次成功是1960年前后党在纠正经济工作“左”倾错误中获得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一些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主要是：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做好综合平衡；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作用；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这些都是付出了重大代价才换来的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情况的正确认识，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意义。在它的指引下，从1962—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尤其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致党中央未能纠正这些错误，终于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导致“文化大革命”。这个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损失。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第二次曲折。

以上两次历史性飞跃实现之前的曲折探索过程表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的结合虽然受到干扰，但毕竟在一段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结合，认识了革命和建设的一些客观规律。这些认识，未能引起对整个革命和建设规律认识的总体质变，但却实现并逐步增加了部分质变，为总体质变准备了条件。这一过程生动地说明，能否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的结合，是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因为结合，才有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才有1957年国民经济的发展和1962—1966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由于结合受到干扰，才出现大革命的天折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才造成1959—1961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和“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灾难。

三、飞跃的实现

飞跃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本身也是一个现实过程，有它的起点和终点。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主革命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转折点，也是两次飞跃的起点。从那以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就比较顺利，党对整个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避免了曲折，逐步有了完全的或比较完全的认识，实现了认识的总体质变。“七大”和“十三大”分别是总体质变完成或基本完成的标志。

遵义会议到“七大”是第一次飞跃实现时期。

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主革命相结合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独立自主地决定了中央领导机关，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把党的指导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轨道。由于新的中央正确

领导的确立，加上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党有了以黄河为屏障的陕甘宁根据地作为革命大本营，这就使党和毛泽东有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有可能系统总结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因此，遵义会议可以看作是第一次飞跃的起点。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理论建树甚丰。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了许多重要论著，这些论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形成及其特征，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⑤由此出发，他对中国民主革命理论从多方面展开和系统化。主要是：多侧面、多层次地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完整地制定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发展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创造性地论述了党的建设；精辟地阐明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从而完满地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形成了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然而，飞跃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党。对中国民主革命规律，仅仅少数领导人认识是不够的，还要广大党员和干部都能认识。这时，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恶劣影响在党内普遍存在，它严重妨碍了对革命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为了把少数领导人的认识变成全党的共识，必须进一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端正思想路线，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1942—1943年全党开展的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打破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广大党员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并自觉地以此作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从而大大帮助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

“七大”是第一次飞跃完成的标志。在“七大”上，毛泽东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大宪章。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论解放区战场》、《论党》、《论统一战线》的报告和发言，分别对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三大法宝”作了系统的具体的阐发。因此，“七大”的主要报告和发言，本身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科学体系，是到那时为止我们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也是对毛泽东思想所作的最好的概括。“七大”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我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一切表明，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认识，此时已实现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已完全成熟。正如毛泽东所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⑥当然，“七大”没有穷尽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这种认识在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得到深化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是第二次飞跃实现时期。

三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转折点。会议建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会议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从而重新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就使党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探索中，不仅能正确地总结建国3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且能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

势。全会还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干扰，纠正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误解和教条化的错误。这些都为新的探索工作拨正了航向。因此它成为第二次飞跃的起点。

伴随着三中全会的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开端，以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为主要内容。它坚决冲破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从而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扫清了思想障碍，提供了理论前提。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新探索之初，不仅在领导机关而且在全党就能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这是对民主革命规律重新探索时所没有也可能有的，是历史经验的启示。

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新的探索中，十分注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分析中国现阶段的国情，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具体探索工作是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着手，然后在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各个领域逐步展开。六中全会和“十二大”分别对探索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大会的报告，提出我国现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论断。这个论断，从理论上高度概括了我国社会现阶段特殊本质，解决了我们为什么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的问题，为正确解决和深刻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奠定了基础。

“十三大”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探索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大会报告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几年来的一系列论述，精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历史地位、基本特征、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并以此为立论基础，从不同角度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各个方面做了理论概括，初步形成了包括上述十二个观点在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这表明，全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已初步实现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这是毛泽东思想新的、重大的发展。

应当指出，“十三大”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是初步的，它还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进一步完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认真总结近年来的经验教训，在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概括出新的十二条原则，这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进一步落实和丰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今后，全党仍须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继续把这篇文章做好。

从遵义会议到“七大”，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都是十年左右的时间。两次飞跃的实现，既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关键在于党中央领导集体，如果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指导思想正确，它就能比较顺利，避免大的曲折；又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又是全党的事业，只有广大党员和干部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端正了思想路线，才能更好地认识和运用革命和建设发展的规律；还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的理论基础。这两个理论的形成、

丰富和发展，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

四、几点启示

总括起来，我们党对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探索和认识历经20多年，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认识历经30多年。这一事实说明，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或建设，都是一个反复实践，不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的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它给了我们如下启示：

（一）必须深刻认识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最重要是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毛泽东在谈到认识国情的重要性时说：这是一条规律，是一个千百万种事物与人层的最本质的规律，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实践证明，只有认清中国国情，才能认识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对国情的认识越深刻，对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就越正确。一切对革命和建设规律右的或“左”的认识，都由对国情的错误认识而来；一切对革命和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都是科学地分析国情的结果。在民主革命阶段，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都是由于没有认清中国革命发生的国度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毛泽东之所以能充分揭示中国革命的规律，正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以此作为认识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犯的急于求成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是由于对我国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缺乏深刻的认识，前者要超过这个当前发展阶段；后者把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时期当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邓小平等正是认清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重要的国情，才正确认识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

（二）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两次历史性飞跃，都是与两次思想解放运动相伴而来的。在民主革命阶段，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制造的对马列、对共产国际、对苏联的教条，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压制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延安整风运动使党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思想上获得了大解放，为全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取得共识，为“七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如果没有那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七大”，也就没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个人崇拜，设禁区、下禁令，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教条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思想解放的讨论。以它为发端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思想僵化，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作风，为全党重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如果没有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就不可能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事实充分说明，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实际，开拓新思路，破除旧观念，涤除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束缚思想的条条框框。但是，解放思想并不是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⑦右和“左”都是思想和实际相脱节，主观和客观相分离。思想落后于当前实际是右，陈独秀把

17、18世纪西欧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搬到20世纪中国来，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超过当前实际是“左”，王明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模式搬到中国民主革命中来，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急于求成，其认识根源也是思想超过当前实际。而一切正确的认识，必然是也只能是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其所以是科学理论，就是因为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实事求是的光辉体现。因此，要正确认识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反右，也反“左”。

（三）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既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不仅仅是党的领导人而且是全党的事业，那么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思广益。两次飞跃的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处理得好的时候，都是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民主集中制得到贯彻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处理得不好的时候，都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民主集中制遭到损害的时候。对革命或建设每一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无不凝聚着集体的智慧，而错误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许多是一个人说了算造成的。探索民主革命规律的第一次曲折，同陈独秀的家长制有联系；第二次曲折，同王明对待不同意见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分不开。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两次失误，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的一言堂。陈云说过：“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⑧相反，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创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的初步形成，都是党内民主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注释：

①、②《“十三大”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第58、59页。

③、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6、824页。

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1页

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7页

⑦《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23页

⑧《陈云文选》（1956—1985），第246页